

「嘔血心事無成敗，拔地蒼松有遠聲」^①

——悼念王元化先生

● 林同奇

王元化離開我們已經很長時間了，雖然噩耗並不突然，但我仍然無法擺脫因失去一位可做心靈對話的良師益友而陷入茫然若失的心情。自從2007年得知他身患惡疾之後，為了排遣其病中煩悶，我時常打越洋電話給他，談些他的思想，並介紹一些他很感興趣的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的思想。在我案頭擺列了他贈送給我的其作二十本，不時翻讀。2008年3月，他曾給我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已經由一個精神人變成一個生物人。」並說：「我在治學方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熱愛我的工作，像熱愛我的生命一樣。」最後他說：「自己覺得需要努力的時間還很長，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想法說得更清楚些，讓大家理解它們。還有很多話想和你多談一會呢，但是身體虛弱，沒有力氣說了。」這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後一封信，一個多月後他就走了。

我和王先生初識是在1992年9月他來美參加杜維明主持的「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研討會。我們同住在靠

近哈佛大學的一家小旅館。在會上王先生作了有關考證的發言，提到他的〈「達巷黨人」與海外評注〉一文。我在發言中支持了他的觀點。由於這篇文章涉及史華慈，他請我將該文轉給史先生，後來我也照辦了。不過史沒有回應。我猜測他不會反對王先生的批評，因為他在訓誥上一貫重視中國學人的見解。會議期間有一天吃早餐偶然相遇，我們就邊吃邊談，不到四十分鐘。會後各奔東西，再也無緣相聚。曾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相贈。幾曾何時，已黃泉無語，天人永隔，哀哉！

由於我當時正在研究國內改革開放後興起的思想論域，王先生創辦的《新啟蒙》引起我的注意（我手邊還保存着二十二年前出版的這套刊物，共四期）。會後我去函請他提供一些有關他自己學術思想的資料，他隨即寄來〈學術簡歷〉、〈胡風事件簡述〉和〈學術思想概況〉三個手抄附件，由王先生口述，傅杰筆錄，寫在現已發黃的稿紙上，共二十六頁，萬餘言。

王元化離開我們已經很長時間了，但我仍然無法擺脫因失去一位可做心靈對話的良師益友而陷入茫然若失的心情。自從得知他身患惡疾之後，我時常打越洋電話給他，談些他的思想，並介紹一些他很感興趣的史華慈的思想。

王元化期望的不是頌詞而是理解。理解遠比評價困難。我寫這篇長文的最終目的在於盡可能地理解王先生的為人治學(特別是其學思特點),或可幫助後來者更好地閱讀和研究他的著作,開發他的學術遺產。

第二年,我在台灣的《當代》雜誌發表的有關「大陸文化熱」的長文,曾提到王先生的《新啟蒙》和他的「反思」^②。但是當時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李澤厚、金觀濤、甘陽、蕭筆父、龐樸及馮契等人。記得當時杜維明曾勸我一鼓作氣寫一本討論這時期中國思想論域的專著,但是那時我的興趣已轉向牟宗三的形而上學,未能成篇。此後我和王先生的通訊雖然沒有中斷,但並不頻繁。待到我再度回轉頭來研讀他的文章時,已經中隔十幾年,我和王先生的思想都經歷了不少發展和變化,我對王先生思想、心靈的理解自然已與往日不同。

近日讀到追憶王先生的文章已有十幾篇,作者多數是受過王先生親炙的學人,他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並體會王先生的為人治學,感受比我真切。特別是許紀霖、汪丁丁和胡曉明的追憶都加深了我對王先生的了解。我只能通過反覆閱讀他的著作加上若干隔洋對話做些推度。不過王先生和我不論在時代感受(他比我大三歲)、家庭背景,甚至於個人遭遇上都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可能有利於對他做設身處地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王先生期望的不是頌詞而是理解。理

解遠比評價困難。我寫這篇長文的最終目的在於盡可能地理解王先生的為人治學(特別是他的學思特點),或可幫助後來者更好地閱讀和研究他的著作,開發他的學術遺產。

本文標題是王先生為他故鄉江陵縣一處古蹟書寫的對聯,頗能反映他的為人與治學。我想先說下聯,它烘托了王先生的為人和品格。夏中義曾說王先生是一位「融入歷史」的思想家,真切地說出了他的一個側面。王先生是一位多側面的人物。拔地而起的「蒼松」則勾畫出了他的另一個側面。

我還清楚地記得1955年毛澤東突然發動的聲勢浩大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後擴大為肅反運動)。當時我由於和胡風有些間接又間接的聯繫,在動員大會上突然遭到點名,群眾聲色俱厲喝令我站起來,低頭認罪,嚇得我一身冷汗。散會後除了我妻子一人外,沒有人敢和我交往。那真是一場殺氣騰騰,令人色變的政治風暴。但是王先生頂住了這場風暴,寧可自己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子」,拒不承認胡風問題屬於反革命性質,可謂「威武不能屈」。在此後漫長的二十幾年中,他



1992年哈佛大學「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研討會(左一為王元化,左三為林同奇)

過着十分清苦甚至貧困的生活，起初幾年他沒有工資，一家全靠妻子張可的工資過日子。有一年多他不得不每天伏案十小時為書局做些翻譯工作，補貼家用。接着文革十年他被打成歷史兼現行反革命，下放農場勞動改造，再度被隔離審查兩年，常常只能領到微薄的生活費，但是他卻寫出了大量的優質論文，堪稱「貧賤不能移」。改革開放後，他被簇擁入學術殿堂和全國第一流學者並座。不久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又當了兩年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享有中央副部長級待遇。那時他已近七十歲。但他沒有心事頤養天年，反而選擇了非常艱難痛苦的「反思」自省的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實在稱得上「富貴不能淫」。

不過，正如「蒼松」也有折枝斷根一樣，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王先生也無法避免內心的怯弱、彷徨和消沉。王先生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自己從不諱言這一點，只要讀讀他的《〈無夢樓隨筆〉序》(1992)就可以感受他的坦誠。他似乎有兩次陷入迷茫。一次是在1950年代末，他自己曾說當時幸有張可邀他一起翻譯莎士比亞的評論，才慢慢恢復了信心。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間，在遭受造反派亂整一氣之後，他被拋在一邊。這期間他無心治學也不敢寫文章，加之被他視為第二母親的外祖母去世，又接着，和他一直相濡以沫、並同時被打成「胡風份子」的摯友彭柏山在迫害中含冤而死。彭幾乎是當時唯一敢和他交往的朋友，彭的去世無疑使他更感孤寂。最後他的父親也走了。張可當時因受他株連在隔離審查中患了重病。他自己淪為政治賤民已近二十年，而文革仍是長夜漫漫不知何時旦也？在彭柏山死前被發配到青海時，王作七律一首送行，現錄如下^③：

邊城風雪鎖春寒，千里荒漠萬重山。
墨瞿有感哭歧路，老聃無意出函關。
豪情都作斷腸夢，歲月漸催鬢髮斑。
心事茫茫誰堪訴，問君更得幾時還？

他說：「我不想為自己掩飾，這是由於渴望工作卻不能工作而流露出來的一點頹唐情緒，自然不足為訓。」^④在這期間，我也下放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了三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經常頭頂烈日，滿身汗水，臥在田裏種西瓜。但是最不好受的是眼看着一批又一批教師被調回原校教書，而自己仍被擱置在大田裏。王先生的迷茫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1976年，他終於盼到了天亮。當「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傳到時，他不由得想起「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一口氣跑到好友滿濤住處，高興得相對流淚^⑤。記得那時我正在上海治療眼疾。我大哥林同濟聽到這個消息後也興奮得手舞足蹈，在房間裏來回走動，口裏不住地說：「中國有救了！中國有救了！」

王先生歷盡滄桑，跨過了敵偽、國民黨、共產黨三個時期，始終不辱身，不降志，不說違心話，不作媚時語，真正體現了孟子所謂的「大丈夫」精神。

如果說「拔地蒼松有遠聲」烘托出了王先生的難有品格，「嘔血心事無成敗」則寫出了他的治學風格。談起王先生的治學，首先令我聯想起清儒章學誠的「性情論」。章用「記性」、「作性」、「悟性」這三種天生的性情來分別解釋學者在「考證」、「詞章」、「義理」三個領域中的造詣^⑥。我認為王先生得天獨厚，在他身上三種資性都相當突出，而且發展比較平衡。他實在擁有一位傑出思想家所必須擁有的資質。

王元化跨過了敵偽、國民黨、共產黨三個時期，始終不辱身，不降志，不說違心話，不作媚時語。如果說「拔地蒼松有遠聲」烘托出了王先生的難有品格，「嘔血心事無成敗」則寫出了他的治學風格。

王元化的工作就是學、思、寫。隨着年齡閱歷的增長，思的成份逐漸增多。到了二十一世紀，當他進入八十歲後已不能閱讀，只能「終日思」，成了真正的「精神人」。經過長期磨練，他的「思」有很強的穿透力和辨析力。

首先，他似乎有很強的天生悟性，並且得到後天的磨練。他曾多次提到太史公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他說「孤獨」讓他頭腦清醒，「苦悶」成了推動他思考的動力。那時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的思想不僅使他感到「精神的力量不可低估和小視」，而且訓練了他的思辨能力。他說，讀黑格爾「幫助我逐漸明白怎樣去思考——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地思考；不是簡單化的，而是錯綜複雜，如剝筍抽繭，層層深入地去思考。這就使我自然而然地養成一種沉潛往復，多面推敲、曲折進展的思想習慣」⑦。不僅如此，「思」成了他的生命。「嘔血心事無成敗」代表了一種不能自己的，一往無前的對「思」的執著。他說：「我熱愛我的工作，像熱愛我的生命一樣。」他的工作就是學、思、寫。隨着年齡閱歷的增長，思的成份逐漸增多。到了二十一世紀，當他進入八十歲後已不能閱讀，只能「終日思」，成了真正的「精神人」。經過長期磨練，他的「思」有很強的穿透力和辨析力。

更令我自嘆不如的是他的記性，他自己顯然已注意到這個長處。我在2008年3月給他的一封電郵中告訴他：「你甚幸似乎集章氏所謂三性於一身。」他回信說：「我只能說我的記憶較好，我現在還能回憶起四五歲的童年生活。跟我家裏其他人相比，這是比較特殊的。」「和家裏其他人相比」一語是謙詞；不過，這種自我肯定在他已是罕見。他往往能隨時記起幾十年前見聞的細節和讀過的章句。例如他在七十歲時還記得三十年前第一次拜見熊十力時，熊先生在門口貼

的一張以年老體衰謝絕賓客的信箋，上面寫着「面赤，氣虧，虛火上延」字樣⑧。這是一種接近「攝影式」或「掃描式」的記憶。可能正是這種罕見的記憶力使他對訓詁、考據有天生的癖好。所以當李澤厚用「學術出台思想淡化」來描繪1990年代初的學界時，他作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針鋒相對地提出應該是「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⑨，這可能多少和他的性情有關。

至於王先生的作性，似乎也很高。他早年寫過一些長、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他的書法遒勁有力，別具一格，最少足以暗示他具有細緻、敏銳的文學與藝術的鑒賞力。如果悟性促使他去探索哲學問題，記性推動他涉足史學，這種鑒賞力則驅使他貪婪地閱讀文學作品，他能同時涉足文史哲並打通三者的界限也和他的性情有密切關係。而且這種鑒賞能力一旦和思辨能力(即悟性)相結合，就讓他可以在美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領域作出貢獻。須要強調的是，他的理論文章在嚴謹和準確之中透露一股熾熱的浪漫氣氛，也可視為作性運作的跡象。

總之，我想說的是：如果我的判斷沒有大錯，王先生實在具備了第一流學者乃至傑出思想家的素質和性情。

其實，王先生的父母也希望他能成為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在王先生小時，他父親曾逐月為他存一筆錢，作為他將來出國留學之用，而且希望他讀理工科。他上的中小學都是很好的教會學校。在他十二三歲時他父親要他參加同窗好友韋卓民(韋先生曾留學歐美多年，通數國語言，又是康德[Immanuel Kant]專家)開的小班，學習

《大學》與《中庸》。「七七事變」時，他十八歲，母親怕他因逃難荒廢學業，專請任銘善（任先生為之江大學教授，專攻文學、音韻、經學）為他一人講授《說文解字》和《莊子》。我們不妨設想倘若王先生按照他父母的意願在當時去美國哈佛大學學習，踏上了一條學院式的學、思道路，他是否有可能成為他所景仰的陳寅恪式的人物呢？

但是由於客觀與主觀的種種原因，例如，民族危亡已逼在眉睫；而年輕的王元化不僅滿腔愛國熱誠，而且正燃燒着「為真理獻身的英雄意願」（夏中義語），他終於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救亡運動。從此以後，作為學者／思想家的王元化就慢慢隱退。他有時自願，有時半自願，有時非自願地去從事許多具體的社會活動或政治任務，陷入所謂「身份認同」的困境，導致了某種「人生錯位」。在此後的漫長歲月中，這種人生錯位，隨着政治波瀾的起伏不定，直接影響了他的學思活動的特點，使他的學思活動明顯地呈現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38-1954）：這個階段是他學思逐漸定型的時期，不可忽視。他在1938年入黨之後，立即成了一個文藝戰線的尖兵，需要在瀰漫着政治硝煙、布滿日偽特務暗哨的環境下進行統戰工作，擴大黨在文藝界的影響。幸好當時江蘇省地下文委的領導人，像孫冶方、顧準都是一些品德才華兼備的人物，他們不僅鼓舞了青年王元化的鬥志，而且對他的為人治學都有深遠的影響。

在這階段，他的學、思集中在文學領域。除了文學創作外，他寫了大量富有戰鬥性的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文章（大部分收集在《文藝漫談》（1947）和《向着真實》（1952）兩本文集

中）。他讀了幾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漢譯世界名著和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特別鍾情十九世紀俄、法、英的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經典作品。他後來說自己是「十九世紀之子」^⑩，根子就在這裏。他從基督教的家庭中接受了耶穌有關大愛（agape）的教義。正是這種大愛經過人道主義文學的滋潤，得到充實、擴展、深化，終於把他引向了馬克思主義。他說：「〔我〕至今（1992年）仍然認為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並說自己：「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走向人道主義的十九世紀文學。相反，倒過來，正是從我對十九世紀文學的強烈愛好而對馬克思學說的人道精神產生了強烈的共鳴。」^⑪這點很重要，因為他的許多朋友都是通過嚮往民主、自由，經由政治激進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也是人道主義文學促使他擁抱了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1938年他寫了〈論抗戰文藝的新啟蒙意義〉一文，試着把啟蒙與救亡結合起來。我不知道他是否受到當時張奚若和陳伯達聯手發起的「新啟蒙運動」^⑫的影響才寫出這篇文章。他後來不贊成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提法可能和這段經歷有關。

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還哺育了他的質樸深沉的審美趣味。1992年我曾問及他對司湯達（Stendhal）和雨果（Victor Hugo）的看法，他說：「〔司湯達〕身上所體現的十九世紀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精神看來似乎不及雨果那樣鮮明顯赫，那樣熱情奔放、淋漓盡致，但實際上是更深邃、更豐富、更複雜。」他還說：「也許我受到我國傳統藝術審美趣味的浸染，我不大喜歡那種筋骨外露、一覽無餘的作品。」^⑬他說他最喜歡的還是契可夫（Anton Chekhov）的戲劇，因為契可夫

自王元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救亡運動後，作為學者／思想家的王元化就慢慢隱退。他有時自願，有時半自願，有時非自願地去從事許多具體的社會活動或政治任務，陷入所謂「身份認同」的困境，導致了某種「人生錯位」。

做到了「功夫深處卻平夷」，「把平凡的生活寫得像詩一樣美」。「最深刻最完滿」地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⑭。

在文藝觀方面，他和當時許多左翼青年一樣，喜歡閱讀俄羅斯蘇維埃的文藝理論，尤其是所謂「別、車、杜」(別林斯基[Vissarion G. Belinsky]、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G. Chernyshevsky]、杜勃羅留波夫[Nikolaï A. Dobrolybov])的理論。其中又以別林斯基最符合他的審美情趣。他說：「我始終不能忘記我在四十年從教條主義擺脫出來時，別林斯基對我發生的影響，他幫助我把自己零碎的感受提升為一些觀念。」^⑮根據這句話的上下文，我認為這裏的「教條主義」最少包括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講話〉中毛提出了政治標準第一，文藝標準第二；正確的世界觀對文藝創作有決定性的作用；作家必須首先改造好世界觀等一系列斷語。而別林斯基和王則認為作家「必須把自己的思想化為自己的血肉」，「在藝術形象的真實性之外沒有甚麼〔政治〕傾向性」，作品不應該有「筋骨外露」的傾向性，「真正的傾向性不能游離於藝術形象的真實性之外」^⑯。王甚至於直指毛的文藝觀，說「使人不得不起拉普派的觀點」^⑰。拉普派是蘇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一股極左的文藝思潮，主張文藝要政治化，把文藝爭論和黨內派別鬥爭掛鉤，迫害了大批文藝工作者。王還指出〈講話〉發表時曾遇到文藝界不少人的質疑，其中包括馮雪峰、胡風、阿壘。他自己在1951年寫了〈論傾向性·世界觀·人格力量〉一文，對〈講話〉提出了質疑。我不知道是否別人也曾指出毛澤東文藝思想中可能有拉普派成份，王的提示可能是研究毛澤東文藝思想的

1955年胡風事件是王元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而他自學的最重要的時期就在這一階段。在隔離審查的嚴酷環境下，他反而贏得了充分時間，讓「思想回到自身的寧靜」。他的學者／思想家的性情第一次得到展露。

一條重要線索。〈講話〉在1949年全國文代會上被推崇為文藝工作的大綱大法。王先生逆潮流而「思」，再一次顯示他的獨立思考的力度。

毋庸諱言，王先生當時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日偽統治下的上海比起大後方的思想資源相對貧乏，當時在重慶、昆明可以很容易接觸馮友蘭的新理學，熊十力的新儒學，太虛法師的佛學，金岳霖的邏輯實證論，雷海宗和林同濟的形態史觀，儲安平等人的費邊主義。造成這種單一性的另一原因是外語能力的不足。王先生漢語功底深厚，可以順利進入中國的經史子集。他的英語在教會的中小學中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可惜十八歲以後沒有機會深造。他可以精讀細研英語著作，但快暢閱讀的能力不夠，錯過了熟悉掌握多姿多采的西方思想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他在這階段逐漸養成一種終身未改的不同於正規學院派的學思運作方式。作為一個文化或政治戰線的尖兵，他得根據形勢的變化和黨的需要對文藝界隨時出現的新動向或具體問題做出快速反應，即就某一具體的特定的人物、事件、觀點，乃至一本新書、一條新聞展開學習與思考，並隨即寫出散篇論文。他幾乎沒有機會圍繞一個學術性課題展開現代學術規範所要求的系統的、窮盡的搜索和研究。因此，儘管他有很強的考據和思考的能力，但是在這階段他始終沒有寫出一本稱得上學術性的專著。他的學者／思想家稟賦在完成尖兵的任務中無法得到施展。如果沒有反胡風運動的政治迫害，他很可能終生做一個知名的左翼文學批評家，和思想家擦肩而過。

第二階段(1955-1979)：1955年胡風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點。他曾說，「我的一生主要得益於自學」，而他自學的最重要的時期就在這一階段。如果說前一階段的自學往往只能是浮光掠影地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在隔離審查的嚴酷環境下，他反而贏得了充分時間，讓「思想回到自身的寧靜」（黑格爾語）。不論讀書或思考，他都有可能而且也確實地做到了熊十力老人的勉語：「沉潛往復，從容含玩。」^⑩他的學者／思想家的性情第一次得到展露，上階段的「人生錯位」也隨之消失。

王先生的自學的另一特點是學思並進。這個特點可能和他往往得按照具體任務開展學與思相關。一旦一個任務下達，他得按任務的要求去學與思。因此他沒有「讀死書」、「死讀書」的習慣，總是邊學邊思。這個特點在他後來不斷地寫讀書筆記得到進一步表現。他的讀書筆記既記下了知識事實，也記下了他的思考成果。

不過，不同於1990年代，在這階段，他更側重於學。可以說在這階段他「選修」（即「學」）了三門「核心課程」：黑格爾思想、《文心雕龍》和莎士比亞作品。每門課都斷斷續續修了好幾年，甚至更長時間。而且在每門課「結業」時都寫出了「論文」，那就是近年出版的三本書：《讀黑格爾》（2006）、《讀文心雕龍》（2007）、《讀莎士比亞》（2008）（簡稱「三讀」）。這三本書雖然最近才出版，但其主體都是在這階段完成的。王先生曾說：「我覺得這個『讀』字比較妥切地表達了這三本拙著的性質。」^⑪突出「讀」字就是突出「學」。足夠的學養是有成效思考的先決條件。王先生在這階段的「學」為他1990年代的「思」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分析一下「三讀」的內容有助於理解這個學思特點。

《讀黑格爾》是王先生讀黑格爾的《小邏輯》（*Wissenschaft der Logik*）和《美學》（*Ästhetik*）兩本書的讀書筆記，分上下編。下編是原始讀書筆記，當然，以學為主，但又雜以思；上編是讀書心得，以思為主，雜以學。可謂學思並舉，步步為營。他曾說，自己「讀書的習慣是精讀，不善於從涉獵中獲得知識」^⑫。學思並舉使他的文字往往散發出智慧的閃光。他曾勸我也寫些讀書筆記，我已照辦，發現效果很好。我願意向青年學者推薦這種方法，因為它是積累知識、磨煉思想的好辦法。

《讀文心雕龍》是王先生這一階段的代表作。這本書其實也是一本讀書筆記，只不過由於學思縝密、前後聯貫，故以專著的形式出現。這本書切實做到了熔考據與義理於一爐，體現了他所服膺的學術與思想統一的原則。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考據為主，仔細考訂了劉勰出身貧寒庶族（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出身士族），可以說做到了「有思想的學術」。書的第二部分以原典釋義為主，提出了「文心雕龍創作論八說」，既富創見，又實之以考據，可以說具有「有學術的思想」的特色。另外，王先生在這本書中稟承熊十力強調的「根底無易其固，而裁斷必出於己」這條原則^⑬，把自己的釋義分為「正文」和「附錄」兩部分。正文力求清理出作者的原意；附錄則着重闡發自己的見解。這種做法比較圓滿地體現了王先生自己的詮釋學思想（王的詮釋學比較接近赫希[Eric D. Hirsch]的史學詮釋學，但又不受他的束縛）^⑭。

至於《讀莎士比亞》，它彙集了西方八大名家對莎氏作品的評論，譯為中文本是為進一步研究莎氏作資料上

1955至1979年，王元化的知識結構得到很大擴充，即從文學領域拓展到哲學領域乃至史學領域。經過和黑格爾思想的苦纏苦鬥，他發展出一種多層次、多側面、曲折進展的運思能力，這種能力是一切思想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的準備，其價值不在於「思」。因此，我認為「三讀」的內容足以說明王先生在這階段的學思特點是學思並進，以學為主。

綜觀這一階段，王先生不僅在寫作上斬獲甚多，而且他的知識結構也得到很大擴充，即從文學領域拓展到哲學領域乃至史學領域。但是我認為這階段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思辨能力有明顯提高。十年磨一劍，正如上文所說，經過和黑格爾思想的苦纏苦鬥，他發展出一種多層次、多側面、曲折進展的運思能力，這種能力是一切思想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不過，在這階段他仍然保持早年的針對具體事物展開學思的習慣，例如，《讀文心雕龍》就和某些「規範化」的博士論文或專著不同。它不是從某種抽象的學說或固定的模式出發，而是從《文心雕龍》這本書中所提出八個具體問題或觀點出發，並以文本詮釋的方式展開學思，找出其中內在聯繫而綴連成書。這種特點是研究與理解王先生著作必須掌握的線索。

文革結束，經過兩年徘徊，中國終於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大道，王先生理應更好地發揮他的學者／思想家的稟賦，但是歷史不同於邏輯，作為思想家的王元化的出場還得推遲十年。

第三階段(1979-1989)：1979年王先生正式平反後，復出中國文壇。這一次他不是以一個文藝尖兵的身份，而以一位文化思想界的大員的身份出場。而且他立即投身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思想大潮之中，迅速成為一位學術思想界的重要人物。1981年他和王力、呂叔湘、錢鍾書、王瑤等同時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他的許多著作得到出版或重印。許多地方請他演講。1982年他被選為

中共十二大代表，赴北京參加十二大。1983年他又襄助周揚起草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講話稿。同年6月他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不久被選為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又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訪問團團長率團訪問日本，並在日本七所大學演講；在是年10月掀起反精神污染運動中他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組副組長(夏征龍為組長)。他關於知性的文章曾被指為與毛澤東思想唱對台戲，「回到康德」。1985年辭去宣傳部部長職務後，這類分心的社會活動一直未斷。

當然，在這十年中，王先生仍在不斷學習、思考，也寫了不少文章(大部分收入《文學沉思錄》(1983)和《傳統與反傳統》(1990)兩書中)。但是正如王先生自己追憶：「八十年代平反後是工作煩亂時期……是心粗氣浮時代，撰文雖多，滿意甚少。」^②他在1988年寫的〈論傳統與反傳統——為五四精神一辯〉一文堪稱這階段的代表作。可是十九年後他指出這篇文章仍然堅守「五四思想必須全盤繼承」的思想底線，因而是錯誤的；它是一種「化為人的血肉」的「既定概念」「一旦碰到和它相異的東西」立即「血脈憤張，為它申辯」的結果^③。

我個人認為，和上階段相比，在這階段王先生的思想出現了某些滑坡現象。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他身上再度出現了第一階段的「身份認同」的困境；他的學者／思想家身份再度受到了過多的非純正學術活動的干擾。他曾和林毓生說：「到了1955年反胡風後，我回到學術裏來。後來文革結束了，我平反了，又讓我去做官。我雖然很不願意做官，做了兩年官，害得我六年的思維處於停滯的狀態。所以我就沒有真正地好好讀

1979年王元化正式平反後，復出中國文壇。在這階段他的思想出現了某些滑坡現象。原因是他身上再度出現了「身份認同」的困境；他的學者／思想家身份再度受到了過多的非純正學術活動的干擾。

過書，與你們不同。」◎「六年」指的是1985到1990年。1990年他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倦鳥歸林，他似乎在說：「是時候了，我該回到我那綠色的家園，獨自在思想的天空自由地探索、追尋。」

第四階段(1990-2008)：王先生曾說：「至九十年代，我才可以說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正軌。」人生苦短，他又說，「我真正能從事自己所嚮往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十幾年。」◎我認為這十八年又可分為兩段：(一)前十年即1990年代，可稱之為反思的時代；(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他逐漸地把目光轉向全球和人本身：反思啟蒙，叩問人性；擔憂人文精神的急劇衰落。

王先生在1990年代的學思特點可以用「反思」來概括。不過，這個詞在王先生那裏有嚴格的特定意義。他曾經多次談到這個詞的含義，其中最完整的表述是下面這段話◎：

〔反思〕是出於一種憂患意識，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感，對過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尋求真知。這種反省之所以發生是鑒於自己曾經那麼真誠相信的信念，在歷史的實踐中已露出明顯的破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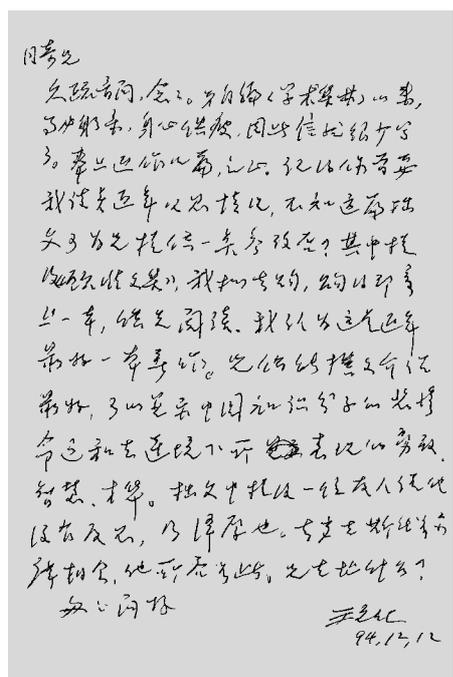
對這段話可以作出以下分疏：促使反思的外在緣起是歷史的慘痛教訓；其內在動力是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或「責任感」；反思的內容是自己曾經「真誠相信的信念」；反思的性質是一種自我「反省」；它的最終目的是求得「真知」。

王自述一生有過三次反思。他在〈我的三次反思〉◎一文有扼要描述，這裏不重述。下面只談一些我個人的感受。

首先，王先生在《無夢樓隨筆》〈台灣版序〉(1997)中深情地引用了該書作者張中曉的一段話用以說明反思的內容和性質。張認為必須把「哲學性的自我反思」和「一般的理智思考」嚴格區分。前者是「思考自己，即把我的全部心靈，作為思考的對象」，後者只是「邏輯分析」。王說：「只有懂得其間區別的人，才能理解反思的真正意義。」◎因此王先生的反思可以說是一次「大震蕩」，一場靈魂的拷問，使他「感到恐懼，整個心靈為此震顫不已」，陷入一場「精神危機」，既帶來了大痛苦，又由於思想得到大解放而感到「大快樂」◎。這種反思顯然和一般哲學家或思想家的純知性反思大異其趣。他說：我的反思可以說是自己所作的自我批評。我認為也許稱之為「反省」更為妥切。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反省」往往會牽動人的整個身心。

寫到此，我遠遠沒有窮盡王先生這一階段的思想。這一階段是王先生

王元化在1990年代的學思特點可以用「反思」來概括。這種反思也許稱之為「反省」更為妥切。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反省」往往會牽動人的整個身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他着手反思西方啟蒙與現代性，尤其擔憂整個個人的去向和命運。



王元化致林同奇信，1994年12月12日。

思想煥發光芒的鼎盛期。初步統計在1990年後短短十年內，他發表的長文短簡共約110篇，其中對五四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反思尤其具特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他的思想視野出現了新的轉折與拓展：在深入發掘中國自身的文化與道德資源的同時，另一方面他開始把目光投向全球，着手反思西方啟蒙與現代性，並觸及理性自身之限制的問題；最後幾年，尤其擔憂整個人類的去向和命運。我個人認為王先生的思想本來就含有許多和史華慈思想相通之處(這點可另文討論)，如今則愈加接近。王先生在他最後一本文集《清園近作集》(2004)中以一篇深情懷念史華慈的短文結尾，不為無故。當時史華慈的主要著作都已有中文版，倘若假以時日，王先生是否在「三讀」之後繼之以《讀史華慈》並非毫無根據的奇想。

王先生年輕時熊十力先生曾贈詩云：「衰來停著述，祇此不無憾」^④，我本意對王先生這段思想作出更充分的詮釋，可已無力完成，只能就此停筆了。期待國內同仁能對他的這段思想作出富有成果的研究。

註釋

① 本文標題中的對聯，是王元化先生1998年為江陵古蹟萬壽寶塔護壁碑廊手書的碑文。先生祖籍江陵，外祖父曾任沙市聖公會第一任中國會長。他對江陵有特殊的感情。參見胡曉明：《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頁164。

② 林同奇：〈「文化熱」的歷史含意及其多元思想流向〉，《當代》(台北)，1993年第86期，頁64-79。

③⑤ 參見胡曉明：《跨過的歲月》，頁106；119。

④ 王元化：《清園文存》，第三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479。

⑥ 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44。

⑦ 參見王元化：〈小引〉，載《讀黑格爾》(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1。

⑧⑩⑫ 參見王元化：〈記熊十力小集〉，載《人物小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頁51；58；57。

⑨⑲ 王元化：〈關於近年的思想答問〉，載《沉思與反思》(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11；16。

⑩ 王元化：〈人文精神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載《清園近作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頁4。

⑪⑬ 參見1992年王元化寄林同奇〈學術思想概況〉稿，頁6-7；8。

⑫ 參見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⑬⑭⑮ 參見歌德(Johann W. von Goethe)等著，張可、元化譯：《讀莎士比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頁6；8；8。

⑰ 參見1992年王元化寄林同奇〈胡風事件簡述〉稿，頁3。

⑱ 王元化：〈小引〉，載《讀莎士比亞》，頁2。

⑳㉑㉒ 參見王元化：〈我的三次反思〉，載《沉思與反思》，頁8；1-9；2、5。

㉓ 參見Eric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0。

㉔㉕ 參見2008年3月30日王元化、林毓生在上海瑞金醫院的談話錄。

㉖ 參見王元化：〈小引〉，載《沉思與反思》，頁2。

㉗㉘ 參見王元化：〈序〉，載《清園近作集》，頁1。

㉙ 王元化：〈台灣版序〉，載張中曉遺稿，路莘整理：《無夢樓隨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38。